

生存与命运

◎〔苏〕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I512.4
244 C2

生存与命运



◎ (苏) 格罗斯曼 著

卞永兴 郑海凌 译

工人出版社



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根据《Октябрь》1988 No1-4 译出

生存与命运(上、下册)

(苏)格罗斯曼 著

严永兴 郑海凌 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印张:34 字数:757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360册

ISBN 7-5008-0362-1 / I·96 定价:11.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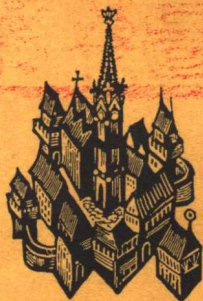
“这是本世纪真正的《战争与和平》。”

罗伯特·钱德勒《生存与命运》英译本前言
“格罗斯曼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生存与命运》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作。”

阿纳尼耶夫《文学报》1988年8月24日

“《生存与命运》的成功在于格罗斯曼对重大主题的高度严肃性和他那令人信服的对历史、道德和政治的思考。”

罗纳德·欣利《纽约时报图书评论》1988年3月9日



九十八

斯特拉姆在寒冷多雪的日子里同妻子和女儿一起回到了莫斯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不想中断工厂的工作，留在了喀山，尽管斯特拉姆已经着手替她在卡尔波夫研究所^①安排工作。

这真是些奇怪的日子，内心同时充满喜悦和不安。看来，德国人依旧令人可怕地强大，准备着一次次新的残酷打击。

看来，战争并没有出现转机。但是人们对莫斯科的向往是自然而然的、合乎情理的，政府开始让一部分居民回莫斯科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人们已经感觉到战争的春天来临的隐秘征兆。不过在战争的第二个冬季，首都看上去毕竟还是愁眉苦脸、一副不高兴的样子。

脏雪如小山似的堆在人行道两旁。市郊的街道上，乡村

①卡尔波夫(1879—1921)：苏联化学工业的组织者，1918年创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化学实验室，现名卡尔波夫物理化学研究所。——译注

小道般的通道把建筑物同电车站和食品店联系起来。许多窗户里伸出的铁皮烟囱冒着烟雾，楼房的墙上挂着被油烟熏黄的冰锥。

穿着短皮袄、系着头巾的莫斯科人象是小县城和农村来的乡巴佬。

从车站出来，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路上就坐在卡车上，他回过头来看一眼坐在他身旁的娜佳那紧皱双眉的脸庞。

“怎么啦，小姐？”斯特拉姆问，“你在喀山一直向往的莫斯科是这样的吗？”

因为父亲看透了她的心思而生气的娜佳什么也不回答。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对她解释道：

“人并不明白，他所创建的城市不是大自然的天然部分。为了从狼群、风雪和杂草那里夺回自己的文化，人不应该放下自己手中的火枪、铁锹和扫把。只要一疏忽大意，只在稍稍分心一两年，那就全完了。狼群便会从森林里出来，杂草就会丛生，城市就会被大雪和尘土淹没。多少大城市已经毁于尘土、大雪和风暴。”

斯特拉姆想让坐在揽私活司机边上的柳德米拉也听到他的高论，从车帮上朝驾驶室俯过身子，通过摇下的半扇小窗问道：

“你还舒适吗，柳达？”

娜佳说：

“只不过管院子人不扫雪，就能使文化毁灭了？”

“你真傻，”斯特拉姆说，“看看这些雪堆。”

卡车颠簸得厉害，所有包袱箱子一下子都在车厢里跳起来，斯特拉姆和娜佳也随着它们蹦起来。他们对视一眼都乐

了。

奇怪，真奇怪。他能想象在疏散至喀山那饱经战祸、痛苦和流浪的一年里，他得以做出自己最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吗？

看来，回莫斯科，他们能体验到的只是巨大的激动。对安娜·谢苗诺夫娜、托利亚、玛鲁夏的痛苦和对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的死去亲人的怀念仿佛同回家的喜悦结合在一起，占据了整个心灵。

但一切并不象想象的那样顺心。乘车途中，斯特拉姆为一些小事大动肝火。他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老是睡觉，不朝她儿子曾经保卫过的大地瞧上一眼而生气。她在睡梦中鼾声大发，在车厢里走动的一个伤兵听到她的鼾声，说：“嗨，这鼾打得就象门火箭炮。”

他对娜佳发火：母亲刚收拾完她吃剩的东西，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玫瑰蜜饼。火车上她对父亲用的是一种愚蠢的嘲笑的口吻。斯特拉姆听到，她在隔壁包厢里说：“我爸是最大的音乐爱好者，并且经常亲自在钢琴上乱弹一通。”

邻座们在聊莫斯科的下水道和供暖设备，聊自由自在不按汇划单和住房面积缴钱的人们，聊带什么东西到莫斯科划算。斯特拉姆对聊这种日常生活话题感到生气，不过他自己倒也聊了房屋管理员和自来水管。晚上当他睡不着觉时，他也想起了得上莫斯科凭证供应商店登上记，想起电话是否给撤了。

可恶的女列车员打扫包厢时，从座位底下扫出斯特拉姆扔下的鸡骨头，说：

“哼，真邋遢，哪象个有文化的人！”

在穆罗姆，斯特拉姆和娜佳在月台上散步。他们从两个

穿带卡拉库尔羊羔皮领子旧式男大衣的青年人身边走过。其中一个说：

“阿布拉姆从疏散地回来了。”

另一个说：

“阿布拉姆快得保卫莫斯科奖章了。”

在卡纳什车站，列车停在一列装满囚犯的军用列车对面。哨兵在取暖货车旁来回走动，囚犯们一张张苍白的脸紧贴在带格栅的小窗户上，哀叫着：“给点吃的，”、“给支烟抽。”哨兵们大声骂着，把囚犯从小窗户前轰走。

晚上，他来到索科洛夫一家乘坐的另一节车厢。头上系着花头巾的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正在铺床，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下铺，她自己睡上铺。她关心的是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否舒适，对斯特拉姆的问题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甚至也没问问，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身体怎么样。

索科洛夫打了个哈欠，抱怨说，车厢里的闷热空气让他困乏无力。斯特拉姆不知为什么对索科洛夫的漫不经心和不高兴他的到来，感到十分难受。

“生活中我第一次看到，”斯特拉姆说，“丈夫让妻子爬上铺，而自己睡下铺。”他说这些话时显得忿忿不平，并且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什么这一情况使他这么生气。

“可我们一直是这样。”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在上铺憋得慌，可我无所谓。”

她于是在索科洛夫的鬓角上亲了一下。

“那我走了。”斯特拉姆说，又一次对索科洛夫一家没有挽留他而感到难受。

夜间，车厢里十分闷热。他记起喀山，记起卡里莫夫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记起同马季亚罗夫的谈话，记起

喀山大学里那拥挤不堪的研究室……斯特拉姆晚上到索科洛夫那里聊起政治时，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那双眼睛是多么可爱而又惊慌不安。根本不象今天在车厢里那样心不在焉和冷漠。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他思忖着，“自己睡上铺，那里更舒适和凉爽些？就这种旧家庭的生活习惯？”

于是，他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的气，在他看来她是他所熟悉的女性中比较温顺、比较善良的女人。他想：“一头红鼻子母兔。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是个乖僻、随和、稳重的人，但同时又是个疑心很重、城府很深、爱记仇的人。是啊，真够她这个可怜人受的。”

他怎么也不能入睡，试着想即将来临的同朋友们和切佩任的见面。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什么在等待着他，他可是胜利而归的，古列维奇和切佩任将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他想：马尔科夫已经仔细考虑了新实验装备安装的各项细节，只是他得一星期后才能去莫斯科，没有他工作就无法开始。糟透的是，无论是索科洛夫还是我，都是一对笨蛋，是两个长着一双没有脑子、瞎眼朦胧的手的空谈家……

是啊，胜利者，一个胜利者。

但这些想法的出现都是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的。

他的眼前出现一批人，高喊：“给支烟抽”、“给点烟草”，出现两个青年管他叫阿布拉姆。波斯托耶夫当着他的面对索科洛夫说了句怪话，索科洛夫谈了青年物理学家兰德斯曼的工作，波斯托耶夫却说：“行啦，兰德斯曼算什么，瞧，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用第一流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他拥抱索科洛夫，补充道：“可最主要的毕竟是我同您都是俄罗斯人。”

电话安了吗？煤气通了吗？难道 100 年前人们把拿破仑赶走回到莫斯科，想的也是这些稀奇古怪的事？……

卡车在楼旁停下，斯特拉姆又见到了自己单元的四扇窗户和去年夏天贴在玻璃上成十字的蓝色纸条，见到了正门和人行道旁的椴树，见到了牛奶店的招牌和房屋管理员门上的木牌。

“电梯当然不开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嘟哝着，朝司机转过身子问道：“同志，您不帮我们把东西提上三楼？”

司机回答说：

“为什么不，当然行。只是您得为此付给我面包。”

他们卸下卡车上的货载，让娜佳留下看东西，而斯特拉姆同妻子一起上楼。他们走得很慢，并且感到惊讶，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二楼上漆布面磨损的黑门、熟悉的信报箱。多么奇怪，街道、房子、东西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一切都没有消失，它们依旧，它们中的人依旧。

有次，没有等上电梯的托利亚一口气跑上三楼，对下面的斯特拉姆叫道：“啊哈，我已经到家咯！”

“在过道上歇会儿，你已经气喘吁吁的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

“我的天哪！”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楼道都成什么了。明天我得上房管所去一趟，逼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组织大扫除。”

瞧，他们又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

“也许，你想亲自打开房门？”

“不，不，干吗，你开吧，你是一家之主。”

他们走进单元，把几个屋子都走了一遍。她没有摘下头巾，用手试了试暖气片，摘下电话听筒，朝它吹了吹，说：

“电话看来是通的!”

然后她来到厨房,说:

“瞧,有水,就是说厕所可以用。”

她走到煤气炉跟前,试试炉灶的开关,煤气没有送。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再没有别的了。敌人给挡住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仿佛 1941 年 7 月 21 日,那个星期六就是昨天。仿佛一切都没变,又好象一切全变了!别人走进家里,他们已经是另一种心情,另一种命运,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为什么如此令人忐忑不安,如此枯燥无聊?为什么失去的战前生活显得那么美好幸福?为什么想起明天就那样令人苦恼——票证供应局,户口登记,用电限额,电梯一会儿开一会儿停,订阅报纸……晚上躺在自己床上重新听到熟悉的钟声。

他跟在妻子后面走着,突然记起夏天临时来莫斯科的漂亮的尼娜,记起她与他们同饮葡萄酒,那空酒瓶现在还在厨房的泄水盆边放着哪。

他记起诺维科夫上校捎来的母亲的来信,记起读信的那个夜晚,记起自己突然去了车里雅宾斯克。记起他就在这里吻了尼娜,她的发卡从头发上掉了下来,他们没能找到它。他感到不安,发卡会不会在地板上被发现,也许尼娜还在这里忘了画眉笔、口红和香粉盒。

但这时司机喘着粗气进来了,他放下箱子,打量一下房间,问道:

“一套单元都是您住吗?”

“是的。”斯特拉姆脸带愧色回答道。

“我们六口人住八平米。”司机说,“大家都去上班时,老祖母睡觉,而晚上她就在凳子上坐着。”

斯特拉姆走到窗前，娜佳站在垛在卡车边的东西旁，又蹦又跳，直往手指上哈气。

可爱的娜佳，斯特拉姆孤立无援的女儿，这就是她亲爱的家。

司机提上来装食品的口袋和塞满床上用品的行李袋，往凳子上一坐，开始卷烟。

显然，他的兴趣全在住房问题上，一直跟斯特拉姆唠叨保健法和区房管所的贪污分子。

厨房里传来锅勺声。

“女主人。”司机说，朝斯特拉姆眨巴下眼睛。

斯特拉姆又朝窗外望了望。

“秩序，秩序。”司机说，“您瞧吧，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被消灭了，人们也将陆续从疏散地回来，住房条件只会变得更差。我们厂里前不久回来一个受过两次伤的工人，当然，房子给炸毁了，带着一家子住进不是人呆的地下室里，老婆当然怀孕了，两个孩子得了结核病。水把地下室给淹了，比膝盖还高。他们在凳子上铺上板子，顺着板子从床上跨到桌子上，又从桌子跨到炉灶上。他开始求爷爷告奶奶，上党委，上区委，给斯大林写信。全部答应，全都允诺，可就是不兑现。晚上他把妻子、孩子、破旧衣物抱上五楼，占据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一间备用房。房间 8.43 平方米。这样整个事情就乱了套啦！检察员把他召去，限他 24 小时内腾出房子，或是去蹲五年劳改营，两个孩子送保育院。他有什么辙？为战争他得过勋章，他把它们全别在胸脯上，别在肉上，午休时当场在车间里上吊自缢了。小伙子们发现后，立刻喀嚓一下剪断了绳索。他被送进医院急救。这件事以后立刻给了他住房证，他暂时还在医院里，但此人够走运的——面积不大，可挺舒适。

结果不错。”

当司机讲完自己的故事，娜佳走了进来。

“东西给人偷了谁负责？”司机问。

娜佳耸耸肩，一面在屋子里走着，一面往冻僵的手指上哈气。

娜佳刚进家门，斯特拉姆就对她生起气来。

“你简直要把小偷放跑啦。”他说，可娜佳不耐烦地挥下 hands，朝厨房嚷嚷：“妈，我饿得要命！”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这天表现得特别精力充沛，使斯特拉姆觉得，她要是把这股子精力用在前线的战事上，德国人非从莫斯科后撤 100 公里不可。

管道工把供暖装置接通后，暖气管显得正常多了，可也是，它们很久没烧了。把煤气工找来可不容易。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电话打到煤气公司经理那儿，经理从抢修班里派来了一名师傅。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所有煤气嘴都点上火，把烙铁搁在上边，尽管火苗很弱，已经可以不穿大衣呆着了。司机、管道工和煤气工干完活以后，面包口袋就完全变轻了。

快到晚上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还在忙乎家务活。她把刷子缠上抹布擦干净天花板和墙上的灰尘。她洗刷干净枝形吊灯架上的尘土，把枯花扔到黑漆漆的楼道里。她收集了许多破烂、旧纸、碎布，牢骚满腹的娜佳提着桶往污水坑里倒了三次垃圾。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把厨房和饭厅里的器皿全都重新洗了一遍，而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她的指挥下把碟子、盘子、刀子、叉子统统擦干，那套茶具她没有委托给他。

她在洗澡间洗衣服，在煤气灶上熬油，把喀山带来的土豆

挑拣了一遍。

斯特拉姆给索科洛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玛丽娅·伊万诺夫娜，她说：

“我让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睡了，他一路上太累了，不过，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去叫醒他。”

“不，不用，我没事想闲聊一阵。”斯特拉姆说。

“我真是幸福，”玛丽娅·伊万诺夫娜说，“我一直想哭。”

“请上我们家来，”斯特拉姆说，“您怎么样，晚上有空吗？”

“我，您怎么啦，今天不行。”玛丽娅·伊万诺夫娜笑呵呵地说，“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和我都有好多事要干呢。”

她问了下供电限额和自来水管道。他突然间粗鲁地说：

“现在我去把柳德米拉叫来，她接着同您谈自来水管道的事。”并且马上用明显的寻开心的语气补充说：“可惜，真可惜，您不来，否则我们读读福楼拜的诗篇《马克斯与莫里兹》。”

但她并不理会他的玩笑话，喃喃地说：

“我晚些时候打个电话来。若是我一间屋里有多少事要张罗，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同样会有这些事要忙乎的。”

斯特拉姆明白，他那粗鲁的语气得罪了她。蓦地，他想回喀山去。人就是这么怪。

斯特拉姆打电话给波斯托耶夫，但他们那里好象还没有通电话。

他给物理学博士古列维奇打电话，邻居说古列维奇上索科利尼基他姐姐家去了。

他找切佩任，但没人接电话。

突然间电话铃响了，一个男孩的声音打听娜佳，可娜佳此刻正提着垃圾桶完成她的航程呢。

“谁打听她？”斯特拉姆严厉地问。

“这并不重要，一个熟人。”

“维佳，你在电话里絮絮叨叨够了吧，来帮我挪下碗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叫道。

“我同谁絮絮叨叨了，在莫斯科谁也不需要我了。”斯特拉姆说，“哪怕给我来点吃的也好呀。人家索科洛夫已经酒足饭饱，躺下睡了。”

看来，柳德米拉把家里搞得乱上加乱，到处是一堆堆衣服，从碗橱里倒腾出来的一套炊具还在地板上放着，大锅小锅、洗衣盆、口袋都影响在屋子里和过道里走路。

斯特拉姆心想，柳德米拉不会先进托利亚的房间的，但他错了。

“维佳，维克托，你到托利亚的屋子里去一下，书柜里有个中国花瓶，我得把它洗洗。”她满脸通红，眼睛里露出忧虑的目光。

电话铃又响起来，他听到娜佳在说：

“你好，我哪儿也没去，妈妈让我倒垃圾哩。”

而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直催他：

“维佳，帮帮我，别睡，要知道还有多少事哪！”

妇女的内心中有多么巨大的本能啊，这种本能多么强大又多么简单。

傍晚时，乱杂无章已被战胜，屋子里变暖和了，家里又出现了战前所习惯的样子。

晚饭在厨房里吃。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做了烙饼和煎肉饼，稀饭是白天就熬好的。

“是谁给你打电话？”斯特拉姆问娜佳。

“是个男孩子。”娜佳答道，自己也乐了，“他已经连着打了四天，终于给打通了。”

“你，怎么，同他还有书信来往？事先告诉了行期？”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问。

娜佳不高兴地皱皱眉头，耸耸肩。

“可我哪怕有谁给我来个电话也好。”斯特拉姆说。

晚上维克托·帕夫洛维奇醒了，柳德米拉穿着衬衣站在托利亚房间前，房门敞着。她说：

“你瞧，托连卡，我终于来得及把一切都整理好，在你的房间里仿佛未曾有过战争，我心爱的孩子……”

九十九

科学院的一个会议室里聚集了从疏散地归来的科学家。

所有这些年迈的和年轻的、脸色苍白的和谢顶的、长着大眼睛的和目光锐利的小眼睛的、宽脑门的和窄脑门的人们都聚集在一起，感受到一种生活中曾有过的平凡而又崇高的意境。一大堆存放在不生炉子屋子里的潮湿的书页和讲义，无数在翻起领子的大衣里产生的公式，用冻得通红的手写下的论文，用发粘的土豆和烂圆白菜叶做的莫斯科凉拌菜，为各种票证所作的忙乱，想去登记咸鱼和定量供应外植物油的无聊的想法——所有这一切突然间全被抛到了脑后。熟人们相见都大声问好。

斯特拉姆见到了同希沙科夫院士站在一起的切佩任。

“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斯特拉姆盯着他可爱的脸庞，重复道。切佩任拥抱他。

“您的孩子们从前线给您写信了吗？”斯特拉姆问。

“您好哇！写，他们写。”

根据切佩任没有笑容而是皱着眉头的表情，斯特拉姆明

白，他已经知道托利亚的死讯。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他说，“请向您的妻子转达我的问候，深切的问候。我的和娜杰日达·费奥多罗夫娜的。”

切佩任立刻又说：

“读到了您的论文，很有意思，相当出色，比想象的还要出色。您知道吗，比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到的更有意思。”

他亲了亲斯特拉姆的前额。

“嗨，那里有什么，空话连篇，空话连篇。”斯特拉姆说着，腼腆起来，感到很幸福。

当他来出席会议时，一个想法在困扰着他，使他激动不安：谁会读他的论文，他们将会对它说些什么？要是突然谁也都没有读过呢？

听到切佩任的话以后，他立刻充满了信心——只有关于他，只有关于他的论文将是这里的话题。

希沙科夫站在边上，斯特拉姆想对切佩任说许许多多话，想告诉他从未当着外人、特别是当着希沙科夫的面说过的话。

斯特拉姆瞥一眼希沙科夫，记起了格列布·乌斯尼斯基常说的一句玩笑话：“金字塔大水牛！”

希沙科夫那正方形的面团团的脸、傲慢多肉的大嘴、指甲光滑的肥实手指、银灰色敦实强壮的平头、做工考究的西服——所有这些使斯特拉姆感到压抑。见到希沙科夫，他每次都会产生一个念头：“他了解我吗？”“会打招呼吗？”当希沙科夫慢慢吞吞地用多肉的嘴唇说出似乎也是肉鼓鼓的话时，他一面生自己的气，一面感到高兴。

“傲慢的公牛！”当斯特拉姆同索科洛夫一谈到希沙科夫时便说，“我在他面前总发怵，好象小地方的犹太人面对骑兵